

观马背风华 品穹庐乾坤

——江西省博物馆辽代女性主题文物展

杨卫 曹珺

近年来,江西省博物馆连续策划推出女性主题展览,已形成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体系。2026年适逢生肖马年,博物馆特别聚焦于古代马上民族中的女性形象,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推出年度特展“马上云沙马下花——辽代女性主题文物展”。展览甄选了包括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吐尔基山辽墓、辽圣宗贵妃墓、耶律羽之墓等重要辽代墓葬出土的103件(套)珍贵文物,涵盖金银器、铜器、漆器、玉器、陶瓷、琥珀、水晶、玻璃器等多个门类,分为“英姿华彩”“穹庐器象”“四时歌猎”“器载和合”四个单元,从妆容服饰到日常起居,从政治活动到跨文化交流,展现辽代契丹女性在驼铃与牧歌交织岁月里的铿锵注脚。

层层递进的单元设定

展览以契丹女性的社会身份为起点,构建了一条从“个体表征”到“日常生活”,从“制度参与”到“文化交流”的完整叙事链。四个单元由表及里、由物及人、由个体及制度,形成了一套兼具学术深度与公众可观性的展览结构。

英姿华彩——契丹女性的身份标识与审美表达

契丹女子饰物,集金银、琥珀之珍,融草原雄健与中原雅韵于一体,在风沙中灼灼其华,于鞍马上铮铮其音。恰似契丹女儿之魂:既承北地之豪烈,亦纳文明之温润,刚柔相济,臻而不骄。

第一单元“英姿华彩”集中展示契丹女性的冠饰、面饰、佩饰及妆发用具。内容分为金花剪影、琥珀凝光、环佩鸣沙、银套添妆四个部分,展出公主金面具、公主高翅鎏金银冠、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双狮纹金花银盒等,在题材选择与工艺技法上体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融合特征,折射出契丹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兼具的地域性与开放性。

穹庐器象——契丹女性生活中的习俗与情趣表达

帐中举杯,酣畅淋漓,尽显北地豪情;案前捧盃,幽香慢品,深得中原雅意……契丹女子亦刚亦柔,毡帐风云与茶烟清润相融,游牧的奔放与农耕的沉静于此交汇,铸就了卓然独特的契丹气度。

第二单元“穹庐器象”以辽代饮食器具、茶具为主线,分金樽玉盏、素瓯银壶两个部分,展出人物纹八棱金杯、折肩孝子图鎏金盃花银盏、银扣青瓷执壶、鸳鸯牡丹纹金花银渣斗等,呈现帐中豪饮与案前品茗两种迥异又共存的生活方式,反映出辽代社会在游牧传统与中原礼制之间的继承与融合。女性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一文化交融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表征意义。



展览序厅



展厅一角



嵌宝石鎏金包银漆盒



公主金面具

四时歌猎——契丹女性在“四时捺钵”制度中的高度参与

“千里山川无土著,四时歌猎是生涯。”契丹女子和男子一同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这种流动的生活形态与“四时捺钵”这一独特的民族政治制度深度交织,构成了契丹政权运作的核心骨架。

第三单元“四时歌猎”聚焦“捺钵”制度下的游牧实践,分逐季营居和纵马猎野两个部分。展出金链玉臂鞣、金鈎银鞣蹀躞带、鎏金铜铎、镶玉银鞣蹀躞带、银鞣带等实用器物,既是游牧生活的实物载体,也是契丹特殊政治制度的有力证明。

器载和合——契丹女性视野下的文化交流
辽地北据草原,南临汉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文化的多元共存。丝瓷西去,珠玉东来,不仅推动经济往来,更深植文化交融。辽地融中原典制与游牧气魄为一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

第四单元“器载和合”分南北交聘和丝路通衢两个部分,聚焦来自中原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同区域的器物,如玉砚、双蝶纹青瓷盃、酱釉提梁鸡

冠壶、乳丁纹玻璃盘等,揭示契丹在东西文明交流中的枢纽地位。

开放式结尾——跨越千年的精神图景

在展览尾声,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尾声,以“女性在不同时代穿行”的意象表达,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精神图景。观众仿佛随辽代女性的身影,一同在云沙深处穿行,从历史的旷野跨越时空边界,抵达当下。这一设计不仅是对辽代女性的深情回望,更折射出展览所表达的美好心愿——愿今日女性亦如雄鹰振翅,无羁而行,在自己的苍穹之下,炽烈自由,恣意乘风。

恢宏与精微并存的展陈方式

作为江西省博物馆女性主题系列展的延续,本次展览定位为:彰显女性主题特质,凸显契丹民族风韵,展现文化交流融合之美。

展名溯源于契丹风土歌:“契丹家住云沙中,着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以“马”“云沙”“花”为核心意象,还原辽代女性“苍茫天地,鞍马为家;云沙逐猎,对镜簪花”的生活场景。

展览的色彩体系与材质选择,精准呼应了契丹女性“马上”与“马下”的双重气质。主色调以漠沙褐、鎏金为主,苍茫中透出豪迈,象征着她们驰骋草原的英姿;辅色取胭脂红、象牙白、翡翠绿,温婉中蕴含精致,映照出她们生活中的柔情与典雅。展台材质则选用深褐粗犷亚麻、金属收边与肌理漆,粗砺与细腻交织,质感与色彩对比,衬托丰富且立体的契丹女性形象。

在展陈手法上,展线以轻盈而富有层次的方式,串联起“女性系列”的情感脉络。将辽墓壁画中的人物故事与生活场景,化为沉浸式的叙事方式,使观众走进展厅,仿佛步入辽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空间叙事、色彩、材质的交融呼应,既呈现历史,也在静默中唤起对女性生命力的深切共鸣。

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延伸项目

展览专设互动体验区和配套讲座,以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方式,深化观众对辽代文化的理解,力图在学术表达之外,有效提升展览的公众参与度与文化传播力。互动项目涵盖契丹文字识别体验、公主面具拼图互动、辽墓壁画阅读赏析、“四时捺钵”多媒体互动、情景交融观影空间,以及以精美器物为主题的形象打卡留念环节,兼顾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需求与参与偏好;专题讲座与导览活动,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带领观众领略辽代女性的生活风貌与制度脉络。

(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以陶瓷为桥: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

何飞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看似朴实,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思考。博物馆凭什么成为桥梁?它联结什么、如何联结、联结又能带来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每一座博物馆认真思考并作出回答。作为博物馆人,深感这一主题切中了当代博物馆转型的关键,也为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多年来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恰切的注脚。

博物馆为何能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

“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聚焦了博物馆的联结功能与社会价值。博物馆成为联结世界的桥梁,其底气来自三重独特的禀赋。

其一,博物馆拥有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历史或许会被质疑,口述传说或许会被岁月侵蚀,但博物馆中的器物却以不可磨灭的实物载体为人类文明的联结提供了物质见证。那些承载着中外交流印记的古代器物,无声诉说着千年前不同文明之间的贸易往来。每一件器物,都是一座微型的联结文明的桥。

其二,博物馆具有公共文化属性。它向社会公众敞开大门,无论年龄、职业、教育背景,每一位观众走进展厅,都可以在器物面前平等地观看、感受、思考。这种公共属性,使博物馆具备了联结世界、沟通不同群体的优势。近年来,国际博物馆协会持续强调博物馆的“可及性”与“包容性”,这是博物馆作为桥梁的坚实基础。

其三,博物馆既面向过去,又启迪当下。博物馆收藏的是历史,面对的却是当代观众;展示的是旧物,引发的却是新思。这种跨越时空的交流,使博物馆成为古今对话的有效平台。比如一件古代陶瓷在观众眼中,不仅是过去的遗存,还是启发当代人理解历史、审视自我、思考文明的纽带。

以展览为桥,讲述文明交往的故事

展览是博物馆联结世界最基本也最核心的方式。一场好的展览,如同在有限的展厅中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理解之桥,观众走入展厅,就踏上了一段文明对话的旅程。

陶瓷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有世界性的物质载体之一,既是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器物,又是工艺技术与审美理想的结晶;既扎根于特定地域,又通过贸易交流走向远方,成为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可以说,每一件陶瓷都是一名“文化使者”,每一段陶瓷贸易史都带有文明互鉴的影子。

近年来,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围绕陶瓷与文明交流这一核心命题,持续策划了一系列专题展览。2024年“丝路融合之美——西域来通大唐杯”展览,聚焦西域器型与唐代陶瓷的融合创新,呈现了中国

杯具的发展历程;2025年“西游记——唐代陶瓷中的丝路文明”展览,将展品置于广阔的丝路语境之中,展现唐代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广度与深度;2026年元旦推出的“印迹——古代陶瓷中的马”展览,系统呈现了马匹在丝路物通与文明交流中的关键角色。

这些展览中每一段说明文字的撰写,每一个单元的结构安排,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标:让观众在展览中感知文明交流的历史温度。

许多观众在参观后留言表示:“原本以为丝绸之路只是遥远的历史概念,通过展览才真切感受到,那段历史如此具体、如此鲜活。”这就是展览作为“桥梁”的力量——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消解了文化的陌生感,拉近了此地与远方、古代与当下的距离。

以交流为桥,让博物馆的联结走出展厅

如果说展览是在博物馆中搭建的文化桥梁,那么围绕展览开展的一系列交流活动,则让这些桥不断延伸,将联结的触角探入更广泛的社会空间。

近年来,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围绕主题展览,策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配套活动,推动陶瓷文化从展厅走向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在国际交流方面,第二十一届中国地方交流促进研讨会参访团,于2025年7月走进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切身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地区文化交流方面,来自新疆哈密“领读人”代表团,来到博物馆参观时感叹“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共生相融”,新疆陶瓷工艺传承人研修班学员也专程来馆实地探访陶瓷工艺的传统源流;在社会教育方面,郑州市中小学校外实践教育中心组织教师围绕展览开展跨学科教研活动,将陶瓷文化融入中小学教学体系,“丝路文明书签打卡”项目走进高校图书馆,激发青年学子的浓厚兴趣,在他们心中种下文明交流的种子。

2026年初,一场特殊交流活动令博物馆全体同仁印象深刻。“重走丝绸之路”的新疆东天山骆驼队在队长蒋晓亮带领下来到博物馆。在参观“印迹——古代陶瓷中的马”展览后,博物馆向他们赠送了融合丝路文化元素的文创礼品。蒋晓亮感慨道:“我们的行走和你们的展览,都是在把古代丝绸之路具象化。”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们。是的,博物馆的展览与当代行者的驼队,本就是同一精神的不同表达。伴随着文创产品的流通,博物馆成为一座文化“发射塔”。这正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从馆内联结走向社会联结,从静态展示转向动态传播,让一次相遇成为持续的共鸣。

以精神为桥,从实践中提炼当代启示

博物馆联结世界,更深层的价值或许在于精神

层面。通过多年来策划展览、开展交流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陶瓷史蕴含丰富的发展理念需要被深入发掘与弘扬。

首先是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唐代陶瓷之所以能够达到绚烂的艺术高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外来文化元素的积极吸纳。这有力说明了,文明不是封闭的孤岛,开放、包容、互鉴才是繁荣之道。

其次是互利共赢的交往观。陶瓷在我国古代不仅是实用器皿,还是贵重的贸易商品。它沿着丝绸之路远销欧亚,带来经济繁盛的同时,也推动了不同地区工艺技术与审美情趣的双向流动。这种双向滋养的交往模式,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有着重要启迪意义——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互为桥梁,彼此成就。

再者是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博物馆收藏着文物,更守护弘扬其承载的先辈们的不屈意志和探索精神,通过展览与活动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当代观众,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使命。

博物馆的桥梁价值,并不取决于馆藏规模的大小或藏品级别的高低,而取决于联结的自觉。一座专题博物馆或许没有百科全书式的收藏,却完全可以在特定领域深耕细作,以专业深度拓展联结的广度。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的实践与探索,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以陶瓷为媒介,以展览为平台,以交流活动为纽带,以文创产品为延伸,努力将博物馆建设为一个多维联结的文化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博物馆不再仅仅是文物的存放之所,更成为意义生产与价值建构的公共空间。

让观众在展厅中有文明相通、感悟,博物馆正是跨越过去与未来、此地与远方、自我与他者的桥梁。这或许是国际博物馆日给予我们所有博物馆人最深沉的鞭策与召唤。

(作者单位: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

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

教智护文脉 元智赋新生

文化遗产全链数智解决方案提供商

科技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馆藏设施、文物运输监测、文物展柜、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	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	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咨询服务、展陈消杀服务、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
---	--	--

西安元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 13572270596 (张总) 座机: 029-88246388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 www.microwise-system.com
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9号创业研发园E座4F

官方微信 官方网站

2001年,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3件(套)瓷锺,其中有一件青花龙纹瓷锺。瓷锺通高10.4厘米、口径15.6厘米,圈足高4.6厘米、径4.1厘米,整体呈敞口、弧壁内收、细高圈足形态,上配金盖、下承银托。金钟盖内壁刻有“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钟盖四两九钱”铭文,据此将该器物正式定名“锺”。同墓出土的另外两件分别为青花瑶台赏月图锺与青白釉龙纹瓷锺。这批瓷锺是研究明代瓷锺命名与形制演变的珍贵实物。

据国家文物局全国珍贵文物数据库统计,器名含“锺”的文物共计410件,分藏于91个收藏单位。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藏122件、咸阳博物馆藏87件、安康博物馆藏10件,位列收藏数量前三。从年代分布看,汉代锺占366件,比例约89.3%;材质以陶、铜、瓷为主,数量分别为246件、120件、30件。汉代之后,“锺”这一器型在考古资料中极少出现,明梁庄王墓出土的瓷锺,在命名上沿用汉代“锺”的称谓,器型却与汉代铜锺差异显著,反而接近元代以来流行的高足碗,同时“锺”与“盅”“钟”读音相同,易造成概念混淆。本文通过梳理锺、高足碗、盅、钟四类器物的器型特征与功能,探析其形制特征与演变规律。

锺、高足碗、盅、钟的器型特征与功能释义

锺是一类盛酒与量度兼具的古代容器,《说文解字》中明确记载:“锺,酒器也。”这类器物的核心器型为侈口、鼓腹、圈足,这种造型既能最大化提升盛储容量,又能保证放置稳定,是早期器物设计“实用为先”理念的典型体现。考古发现证实,锺在汉代尤为盛行,目前发现的带明纪年铭文的铜锺,铸造年代多集中在西汉时期。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锺,高45.3厘米、口径18厘米、腹径34.5厘米、底径19.5厘米,上腹部设铺首衔环,便于提携,肩部刻有铭文“中山内府锺一,容十斗”。西安北郊汉墓出土的“清河太后中府锺”,高37厘米、口径14.5厘米、腹径27厘米、底径16.4厘米,鼓腹圈足,腹部设铺首衔环,器身刻“清河太后中府锺,容五斗,重七斤,第六”十六字铭文。这两件锺分别标注了五升、十升的容量,可见其兼具量器属性,且整体容量较大。“清河太后中府锺”出土时,内部留存有26公斤翠绿色液体,经检测,液体成分与现代酿造酒相近,为文献中“锺为酒器”的记载提供了直接的实物佐证。汉代锺容量大、带铺首衔环便于提携,主要用于贮酒。其造字或许与器物本身厚重的特质相关。

高足碗属于适配游牧生活的元代饮器变体,它是碗的特殊形制,起源于元代,与蒙古族“马上饮”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早期被称作“马上杯”“靶杯”,核心功能为贮酒。《中国陶瓷史》描述其特征为口微撇、近底处丰满,下承上小下大的竹节式高足。元代高足碗口径多在10厘米至15厘米之间,高足占器身总高度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方便骑马时手持使用。入明以后,高足碗在元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器型更加多样,功能也从饮酒拓展至盛放食物与饮品。明永乐时期的白釉高足碗造型规整、釉色温润,成为明代宫廷用器的经典。

盅是适配个体饮用的小型日常饮器,《简明陶瓷词典》将“盅”定义为小型饮器,用于饮茶或饮酒,核心特征是小口、浅腹、足部或矮或无。与锺、高足碗相比,盅的体量更小,专为个体饮用设计,器型简洁、便于手持,广泛应用于日常饮食场景。盅的器型在历史演变中较为稳定,始终保持“小而精”的特点,与大容量的锺、高足碗的高足碗形成明显区分。

钟是承载礼乐与宗教功能的古代响器,它与容器“锺”同音,但功能、造型完全不同。先秦是乐钟发展的鼎盛时期,乐钟以合瓦形为基础,分为甬钟、钮钟、镛钟三大类,可实现“一钟双音”,是礼乐制度的核心载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推动乐钟向梵钟转型,成为宗教祭祀的重要器具。宋代金石学兴起引发古钟复古仿制,如北宋大晟钟模仿先秦合瓦形制,但声学性能大幅下降。民间与宫廷的钟类、鼓报时则钟则承袭圆筒形制,钟的功能从礼乐、宗教逐渐走向世俗化,形成多元发展格局。

锺与相关器型的形制关联及演变脉络

锺与高足碗之间呈现出命名的历史回归与造型的时代融合的关系。明梁庄王墓瓷锺与汉代铜锺并无直接的造型传



明梁庄王墓瓷锺

承关系,反而与元代高足碗碗联系紧密。汉代铜锺以侈口、鼓腹、大容量为特征,服务于贮酒需求;明代瓷锺为大口、深腹、细高圈足,明显借鉴高足碗的结构,仅在命名上回归汉代“锺”的称谓。明梁庄王墓中一次性出土3件(套)瓷锺,可见墓主人对这类器物的重视。明代瓷锺的出现,可能是古人借用传统器物名称,结合时代使用需求与审美改造器型的结果,既保留了传统命名的文化内涵,又通过造型调整适配明代宫廷礼仪与实用需求。

锺与盅之间则是由容量与使用场景决定造型差异。“锺”与“盅”读音相近,但器型、功能界限清晰。汉代铜锺与明代瓷锺均具备相对较大容量,多用于贮酒或集体宴饮场景;盅作为小型饮器,服务于个体日常饮茶、饮酒,容量小、易手持。这种由容量与功能主导的造型差异,让锺与盅虽名称同音,却在器物分类与历史演变中始终保持清晰界限,并未因读音重合产生形制上的混淆。

锺与钟之间则因功能分化导致造型长期疏离。“锺”与“钟”源头相近,但功能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二者的发展路径完全分离。先秦时期,钟作为礼乐重器,合瓦形造型服务于声学,与礼仪需求;锺作为容器,侈口、鼓腹、圈足的设计围绕盛储、稳定、提携展开。二者一为精神文化载体,一为物质生活器具,分属不同器物体系,无任何形制传承基础。在后续发展中,钟沿着“礼乐—宗教—世俗”的方向演变;锺从汉代青铜贮酒器,变为明代借鉴高足碗的瓷质饮器,核心功能始终为容器,与响器“钟”始终无交集。

锺及相关器型的整体演变规律

综合梳理锺、高足碗、盅、钟的器型特征与演变脉络,能总结出锺及相关器型器物造型与命名发展的三条核心规律。

第一,功能决定造型,是器物设计的根本逻辑。器物的核心功能直接主导器型的设计方向,汉代铜锺的高容量造型源于贮酒的实际需求,元代高足碗的圈足高足结构适配游牧民族的“马上饮”习俗,盅的小型化造型满足个体饮用的便捷性,乐钟的合瓦形造型则是服务礼乐功能的声学设计,功能的差异直接造就了造型的显著区别。

第二,同音名称的器物,其器型界限由功能与使用场景划定。对于锺、盅、钟这类读音相同的器物名称,并未因语音重合导致器型混淆,反而因功能与使用场景的明确分化,形成了清晰的器物分类体系。其中容器类的锺与盅,以容量大小、集体或个体的使用方式为核心区分标准;乐器类的钟,则以发声的核心功能为主要特征,各类器型的发展边界清晰。

第三,器物演变中存在命名与造型的双重传承特征。明代瓷锺的出现,是古代器物演变中命名与造型双重传承的典型体现:在命名上回归汉代“锺”的称谓,彰显对传统器物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在造型上借鉴元代高足碗的成熟结构,贴合明代的实际需求。这种双重传承,是古代器物发展过程中“文化认同”与“实用至上”理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明梁庄王墓出土的瓷锺,作为明代宫廷用器的重要代表,其器型与命名的双重特殊性,为厘清锺、高足碗、盅、钟的器型关联与演变规律提供了关键线索。梳理各类器物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核心造型特征可以发现,功能需求是推动古代器物造型演变的根本动力,器物的每一处造型设计,都围绕其核心使用功能展开;而器物的命名体系,则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是古人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的体现。功能需求主导造型演变,命名体系承载文化传承,二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器物发展演变的核心逻辑。

【本文系2024年度湖北省博物馆馆藏青年科研项目(课题)“明梁庄王墓青白釉龙纹瓷锺泥金工艺研究”(编号:24B02)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本版责编:何薇 甘婷婷 王龙霄